

## 毛澤東和中國式烏托邦

● 王 英

邁斯納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採取「構建悖論」的方式，將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這兩個完全對立的理論聯繫起來，試圖找到解釋中國革命的特殊路徑。他把目光聚焦在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的衝動之上，聚焦在這種不斷地對於未知世界和更美好世界的追求之中。



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作為專門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美國中國學家，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可謂獨樹一幟。他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中採取「構

建悖論」的方式，將兩個完全對立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聯繫起來，試圖找到解釋中國革命的特殊路徑（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77-78）。邁斯納這種「構建悖論」的方法遭到了很多批評和指責，本文不打算對這些複雜的論辯作出評判，只是希望通過邁斯納所提供的獨特洞察視角來理解毛澤東以及他那個時代，並進一步思考這些歷史和思想遺產對身處市場經濟大潮之中的我們所具有的啟迪和意義。

### 一 烏托邦：在烏有與福地之間

毛澤東在接受社會主義之前已經有了烏托邦思想（辛奉受：〈早年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12月號）。從青年時代就具有的這種烏托邦情結伴隨了他的一生，在各種重大的歷史決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邁斯納正是把目光聚焦在毛澤東這種烏托邦主義的衝動之上，聚焦在這

種不斷地對於未知世界和更美好世界的追求之中。在他看來，烏托邦的意義應該用歷史上的和從人的角度能理解的語言來領會(序、頁3)。烏托邦意味着對於現實世界的超越，它必將具有一個超越現實世界之上的超驗的目標，並且拒絕和現實世界保持絕對的一致；它代表了對於福地樂土的追求。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經把這種烏托邦的思想理解為一種理想和現實狀態之間的緊張狀態，而對這種緊張狀態的消滅也就是對政治行為、科學熱情——實際上對生命本身真正內容的消滅(曼海姆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263。下引此書簡稱《烏托邦》)。

馬克思主義本身也蘊含着對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設想，但馬克思主義在烏托邦的成分之中加上了科學主義的保證，把道德上可以追求的理想之地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結合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者堅信歷史的發展成螺旋式上升，遵循辯證法原理，自然、歷史和思想都是按照這個規律發展，最終達到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社會(施特勞斯[Leo Strauss]編，李天然等譯：《政治哲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936)。邁斯納對馬克思主義中烏托邦和科學主義的聯合表達了他驚人的洞察：

馬克思主義遠沒有破壞對完美的未來的社會秩序的幻想，而是使社會主義未來成為似乎是現在正在發生作用的客觀歷史過程的邏輯的和必然的歷史結果，從而強化了烏托邦

主義。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僅僅是對一個可能在歷史上是「烏有之鄉」的境界的夢想，而是一個被保證的未來有其現實存在的「幸福」。(頁10)

共產主義的完美世界是被科學發展的歷史所保證的一個未來，此一邏輯蘊含着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把美好的烏托邦投射到遙遠的未來，從而在現實中把理想束之高閣。而在毛澤東那裏，他強調永恆的鬥爭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不存在一個所有矛盾都被克服和解決的完美社會。毛澤東的這些概念儘管並不排除歷史的進步，但畢竟含蓄的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這樣一種歷史過程的想像：這種歷史過程引起「全面的革命」和「最終結局」，其結果是所有矛盾和對抗的最後克服。在毛澤東主義的世界觀中，不可能存在矛盾的最後解決，完善的社會統一也毫無可能(頁188)。

毛澤東未來觀中的這種非理想化成分，使他把鬥爭和矛盾投射到了無限遙遠的將來，尤其在關於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中，深刻的透露着這種非理想化成分。所有的一切都面對着毀滅的命運，人類、地球、太陽，那個完美平靜得令人厭倦的烏托邦也許是真的不存在的「烏有之鄉」吧。既然完美的終極目的是不存在的，那麼毛澤東主義者就要求在現實中採取行動，不能在無休止的常規制度中無限拖延。恰恰是這種未來觀中的非理想化成分賦予現實革命以合法性，從而避免了把烏托邦的追求束之高閣，他鼓動人們在現實中為美好的道德理想奮鬥和拼搏。毛澤東主義還預言了

共產主義的完美世界是被科學發展的歷史所保證的一個未來，此一邏輯蘊含着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把美好的烏托邦投射到遙遠的未來，從而在現實中把理想束之高閣。毛澤東強調永恆的鬥爭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不存在一個所有矛盾都被克服和解決的完美社會。恰恰是這種未來觀中的非理想化成分賦予現實革命以合法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市化是通向未來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儘管過程中會出現種種弊端和異化；毛澤東卻試圖把社會主義建立在人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品質之上，試圖依靠精神的力量在農村建立一個農業共產主義，逐漸消除城鄉之別。幾乎可以說，大躍進是毛在民粹主義思想指導下，對城市精英和正規的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發起的一場整體的顛覆運動。

一種未來的烏托邦，他依然同鬥爭、同現在世界上人類經歷的憂患相聯繫，這是一個仍然充滿着危險和不確定性、依然要考慮人類勇氣和英雄主義的未來(頁194)。

也許，「人類的勇氣」和「英雄主義」這些字眼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如此遙遠，甚至顯得有些怪異，但當再次思考邁斯納的「從人的角度來理解」烏托邦，是否可以從中體會出幾分生命本身暗藏的激情和生命存在的意義本身？我們將在這種烏托邦衝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考察毛澤東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探索中國的建設道路，並形成獨具特色的毛澤東的思想體系。

## 二 現代化道路的反思： 一種民粹主義取向

邁斯納提出民粹主義，試圖通過此一特殊視角來理解中國革命，「民粹主義者頌揚人民，尤其是就那些人民的價值與精英的價值比較來說，有的人把獻身於人民作為民粹主義的特徵。當然，民粹主義的一大共性就是他宣稱為人民服務，正是從這一點得出民粹主義反精英的結論」(塔格特[Paul A. Taggart]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頁123)。

毛澤東從未真正相信過城市的力量，相反，他對於農村生活懷着深情的眷戀。他相信普通民眾的力量，相信在普通民眾當中蘊含着豐富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氣。列寧主義相信政黨領導和一小部分覺悟先進者的決定性作用，工人階級的先鋒

隊在蘇維埃歷史上起的作用是農民和普通民眾無法比擬的。但邁斯納指出，毛澤東從來不像列寧那樣絕對信任他的政黨和他的組織。毛澤東總是表示相信群眾自發性和智慧，這是列寧既不具有也從沒有表示過的(頁97)。

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對於城鄉關係的探索完全背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訓誡。馬克思主義認為城市化是通向未來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儘管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會出現種種弊端和異化，但所有這些罪惡都是通向社會主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蘇聯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此理論的實踐形式，把城市工業化建立在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之上，此模式遭到了毛澤東的抵制。他試圖把社會主義建立在人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品質之上，這裏，他是唯意志論者，試圖依靠精神的力量在農村建立一個農業共產主義，逐漸消除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別，減輕對農村的剝削，一窮二白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阻礙，在物質極其困頓的條件下也可以建造美好的社會藍圖。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許多極端舉措，反映了他長久以來對於城市大工業相聯繫的社會和經濟形式的敵視：專業化分工、理性化的官僚機構、大型集中化組織以及正規高等教育(頁65)。幾乎可以說，大躍進是毛澤東在民粹主義思想指導下，對城市精英和正規的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發起的一場整體的顛覆運動。

毛澤東無法容忍少數的城市和官僚精英佔據一種優勢地位。民粹主義相信只有廣大平凡普通的人民

才有權力居於優勢地位。正如塔格特所指出的那樣，民眾的品質用來和精英的腐敗和愚蠢作比較，智慧存在於普通人身上，而且普通人的常識比僵化的書本知識重要得多（《民粹主義》，頁128）。民粹主義傾向於代表沉默的大多數說話，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對現代資本主義以及它使人類和社會付出的代價、特別是對農民所承受的那些代價所提出的抗議（頁104）。毛澤東鼓勵青年人在一個他自己所締造的共和國中造反，打碎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國家和政黨組織，這種奇怪的悖論，只有在民粹主義的衝動之下才能獲得解釋。他傾向於打倒的不是某些個人，清除一小撮反革命和走資派，而是把現有的全部黨組織打碎，然後從下到上重建。他試圖把那些在權力體制剝奪中失去優勢和地位的廣大民眾重新放置在權力的中心。

毛澤東代替被侮辱損害的農民和大眾說話，為了這樣一個身份和發言權，他毅然拋棄了自己經營多年的黨組織和正規的國家機構，他訴諸的不是制度力量，而是一種民粹主義的信仰。在毛澤東和人民中間所形成的關係，不是普通的政治領袖和他的公民，更加類似於一種先知和信徒的關係，他是救星和英雄，在現代社會中他毅然擔當摩西的角色，想要拯救人民於深重苦難之中。然而他是孤獨的先知，還是新的主人？在為自己偉大光輝事業毫不妥協的犧牲時，是否給自己的人民套上了另一重枷鎖？在他這些充滿悲劇色彩的奮鬥歷程中，留給了今天的我們甚麼樣的思考、反省和精神財富？所有這些問題都留在

他的背影之中，似乎遠遠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

### 三 後毛主義時代和實用主義

二十世紀中期的「毛主義烏托邦」曾經吸引了成千上萬西方人的關注，一個由仁慈的哲學王所統治的世界，一個道德的理想國。毛主義的中國徹底消除了不平等，疾風驟雨般的摧毀了官僚體制，也創造了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典範，千百年來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在毛時代的中國奇迹般地成為現實。

文化大革命那種鼓舞了不止一代人的狂熱理想主義，湧流在人們心靈深處的關於道德理想國的憧憬，伴隨着那場大革命的落幕，也漸漸平息。在熱情退去的年月裏，人們開始正視自我，並學習反思歷史。真實的生活像廢墟一樣逐漸展現，許多人開始意識到，盧梭式的道德理想國在人世間建立的過程，其實是伴隨着血腥、恐怖，是以更大的奴役和不平等來換取形式上的平等（參見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也許是由於毛澤東時代過於強調個體覺悟和人的主觀能動性，也許理想主義狂熱所帶來的痛苦記憶猶新，後毛主義時代的領導人巧妙地避開了談論共產主義理想，而傾向於講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發展才是硬道理，集中精力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提高全體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樣審慎而務實的風格贏得了自上而下一致好評，從貧困窘迫中間解脫出來，

毛澤東代替被侮辱損害的農民和大眾說話，毅然拋棄了自己經營多年的黨組織和正規的國家機構，他訴諸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信仰。毛和人民的關係不是普通的政治領袖和他的公民，更加類似於一種先知和信徒的關係，他是救星和英雄，想要拯救人民於深重苦難之中。然而，他是否給人民套上了另一重枷鎖？

後毛主義時代集中精力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技術進步成為衡量一切的標尺，人必須執著於技術。「後文革」時代人們紛紛從理想中逃逸，一切的社會關係和道德價值都被還原為金錢尺度，精神價值逐漸失去了最後的地盤，人們又不得不面對一個信仰缺失、精神空虛、金錢主宰一切的世界。這是誰的悲哀，又是誰的過失呢？

生產能力的提高，消費水平的升級，似乎比任何空洞的政治教條都更容易激發人們對於這個政權的支持和信心。

為了糾正過份道德理想主義帶來的災難，後毛主義時代謹慎的把目標和理想放置在了遙遠的未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幾十年，也可能幾百年，在經濟基礎發展未達到一定水平時，不能奢談上層建築，不能夠過份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決定歷史進程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黨的主觀意願」為轉移，這樣一來人們就必須承認客觀規律的制約並遵守客觀規律（頁201-202）。集中精力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技術進步成為衡量一切的標尺，毛澤東年代的瘋狂和激情被當作歷史的惡性病變，輕輕的抹去，人必須執著於技術，這也許注定是一個價值和工具分開的時代，而且也注定是一個用手段來取代目的的時代；執著於技術起到了一種良好的消解作用，它四兩撥千斤的巧妙地化解了人類生命中本能的對於未來美好世界的幻想。幻想是不真實的，然而技術進步卻可以量化衡量：

鑑於中國的貧窮落後，要走的路還很漫長、堅信，因此，共產主義目標的實現還很遙遠。在這期間，應將人力盡可能的投入到生產中去，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經濟基礎，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頁202）

學者在研究烏托邦與實用主義關係時，注意到「後文革」時代人們

紛紛從理想中逃逸，一切的社會關係和道德價值都被還原為金錢尺度，精神價值逐漸失去了最後的地盤（何中華：〈烏托邦與實用主義〉，《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2期）。後毛主義的實用主義精神滲透從官方到普通民眾的每一個領域，似乎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精神風尚的最佳導向。在剛剛經歷了道德烏托邦氾濫的惡果後不久，我們又不得不面對一個信仰缺失、精神空虛、金錢主宰一切的世界，這是誰的悲哀，又是誰的過失呢？

邁斯納冷靜地指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的這種嚴酷悖論。在中國還很貧窮落後，物質匱乏時，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各種景象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當中國從經濟匱乏狀況急速轉變為一種相對富裕的境地時，未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景象卻幾乎被人們遺忘（序）。人們在經濟發展規律面前無能為力，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只有等到物質文化極大豐富時，才可以談論社會主義目標，而這個未來又似乎特別遙遠，遙遠到不具備任何意義，也許，這就是烏托邦被完全拋棄之後，人們所面臨的精神危機之原因吧。未來也只不過是當下的平庸延伸，誰會為一個為經濟發展規律所保證的無限遙遠的未來烏托邦作出現世的執著追求呢？

## 四 結 論

不管邁斯納的觀點和方法論在一些中國學者看來有多麼「怪異」，但至少可以從他的分析中得到某些

有益的思考與觀察的角度。經歷了烏托邦憧憬幻滅之後，我們也許可以更為清醒地反思自己所處的時代。如果在技術的重負之中，日益地感到內心的空虛和痛苦，也許可以體會到邁斯納的悲哀和執著：

革命的終止並不是由於沒有實現烏托邦的夢想，而是由於這些夢想被置於如此遙遠的未來以至於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看到它實現的可能性。這正是後毛主義時代徹底的反烏托邦性質所起的作用。(頁216)

對於那些不甘心等待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帶給我們一個美好未來的人來說，夢想和烏托邦的衝動依然

存在，畢竟還會有一些為了真實而美好的未來世界而努力的人。曼海姆說，烏托邦的消失帶來事物的靜態，在靜態之中，人本身變成了不過是物……當歷史不再是盲目的命運，而愈來愈成為人本身的創造，同時烏托邦被摒棄時，人便喪失了塑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喪失其理解歷史的能力(《烏托邦》，頁268)。假如人不僅僅是歷史中的一個玩偶和冰冷的符號，而有追求生命意義的可能，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回過頭，重新思考毛澤東和他所留下的那一段歷史？他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鬥，卻以悲劇落幕，在這沉重的悲劇帷幕之後，我們是否可以問，歷史還留給了我們甚麼？

曼海姆說，當歷史不再是盲目的命運，而愈來愈成為人本身的創造，同時烏托邦被摒棄時，人便喪失了塑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喪失其理解歷史的能力。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回過頭，重新思考毛澤東和他所留下的那一段歷史？

## 跨文體書寫的困境

### ● 思 郁



張旭東：《紐約書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一般說來，每一位寫作者都有比較熟悉的一種寫作方式，常用的也只有一種文體，這種獨特的寫作方式和文體就是他自己的風格和言說方式。比如說，經常寫小說的作家和做學問的學者之間的文體風格差別就很明顯。作家注重想像和虛構，學者注重理性分析和邏輯推導。當然，這種區分也並不絕對，跨文體乃至跨語際書寫(劉禾語)正